

学习鲁迅
批判尊孔反法思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习鲁迅 批判尊孔反法思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呼和浩特

学习鲁迅 批判尊孔反法思想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字数：30千

1973年12月第一版

197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750册

统一书号：3089·48 每册：0.11元

目 录

鲁迅是坚决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家	周建人	(1)
学习鲁迅批判尊孔反法思潮的革命精神	黄曼君	(7)
鲁迅——批孔的急先锋		
——学习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札记		
	王士菁	(16)
反动派为什么要吹捧孔子?		
——学习鲁迅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一点体会		
	薛 喆	(23)
孔子的幽灵帮不了林彪的忙		
——读鲁迅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辛有光 何民胜	(28)
批孔是一场阶级斗争		
——读鲁迅杂文《十四年的“读经”》		
	羽 溪	(31)
把孔孟之道的“老调子”清除干净		
——学习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		
	钟 闻	(34)
• 资料 •		
鲁迅笔下的孔子		(38)

鲁迅是坚决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家

周建人

孔子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末期的反动政客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他在奴隶社会日趋没落的时代，竭力维护殷周以来的奴隶制统治，宣扬了一整套维护旧制度的反动思想和政治主张。由于他的思想实质是复古守旧，反对革新，所以历代剥削阶级和反动统治者总是把孔子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借以欺骗群众，腐蚀人民，以达到他们维护或者复辟旧制度的目的。而广大劳动人民要推翻旧制度，批判旧世界，就必然要打倒孔子这个偶像。因此，两千多年来，在思想领域中，尊孔和反尊孔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地进行着。

毛主席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这种性格也表现在同孔子和尊孔思想的斗争上。鲁迅，“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坚决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家。鲁迅对中国几千年来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的顽固堡垒孔家店进行了长期的、持久的、顽强的战斗。当鲁迅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写了许多卓越的小说、杂文和思想批判论文，对吃人的旧礼教和封建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当鲁迅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而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

共产主义战士，他更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锐利武器，以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剖析现代中国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的反动本质，并把反尊孔的斗争看作是当时反“围剿”和反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在批判孔家店的战场上，紧密联系现实的政治斗争，深刻地揭示了孔子和孔子之教的反动阶级本质，揭露了孔子之徒尊孔的反动面目和他们的罪恶目的。

孔子的反动思想基础是“天命”论，宣扬什么“天”是主宰一切的，“天命”是不能违犯的。他宣扬“天命”论的实质就是要劳动人民“做稳奴隶”，不要起来造剥削阶级的反。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这就是孔子所要达到的万古不变的“天命”！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仁”的内容又包括“孝悌”、“忠恕”等等。一句话，就是剥削阶级所宣扬的虚伪的“仁义道德”。鲁迅抓住了孔子这个要害，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鲁迅在二十年代前后写了《我之节烈观》、《十四年的“读经”》、《论雷峰塔的倒掉》、《二十四孝图》等文章，象一柄柄利剑直刺孔子思想的心脏。鲁迅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他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孔子的“仁”，也就是后来孔子之徒大肆宣扬的所谓“仁政”、“王道”。它实际上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掩盖其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镇压的遮羞布。鲁迅曾经多次揭露过他们的这种骗人的谎言。鲁迅指出：“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

定要有霸道跑来的。”因此，“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孔子曾在鲁国当过“警视总监”，上台七天就杀死了反对他的少正卯。这是“仁政”吗？这是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孔子自己从来没有实行过什么“仁政”、“王道”，然而孔子之徒却把孔子之教奉为中华民族的“国粹”，把它吹捧为“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一句话就戳破了他们的假面具。他说：“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原来这不过是用来麻醉人民的毒药。正如鲁迅在《春末闲谈》一文中所比喻的，象细腰蜂用毒针把青虫螫得不死不活一样，以便使人民“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孔子之徒要“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至于“救国救民”这种骗人之谈，“从古以来，并无良效”。相反，却把中国人送给外国人做奴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鲁迅无情地指出：“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难怪不仅历代反动统治者要尊孔，外国侵略者也总是要尊孔。但是，对于孔子之徒来说，把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又算得了什么呢？在他们看来，“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最后一句话是孔圣徒胡适奉献给外国主子的。鲁迅在这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无耻的帮闲文人卖国求荣的嘴脸。

孔子的学说是如此适合于反动统治阶级的胃口，所以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以及外国侵略者总是要把孔子抬出来，“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一九三五年，正当国内蒋介石反动派竭力提倡“尊孔读经”，国外帝国主义者大造孔庙的时候，鲁迅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著名

的讨孔檄文，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深刻地揭露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反动作用和反动派尊孔的阶级实质。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生在奴隶社会日益崩溃，封建社会开始兴起的时代，但是他想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到处游说，妄图恢复奴隶制度。因为他的思想是反动的，所以在当时处处碰壁。虽然孟子称他为“摩登圣人”，“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子在生前，并没有人把他当作“圣人”。他“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子的“圣人”称号，完全是后来的反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而加给他的。

其实，权势者吹捧孔子，也并不是真正崇拜这个“圣人”，而是把他当作“敲门砖”而已。鲁迅形象地一语道破了孔家店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远的不用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还是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蒋介石建立法西斯独裁专政，无不举行“尊孔祀圣”的大典，提倡“复古读经”。他们这些“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并不是真正想回到孔子的时代，他们是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企图利用孔子这块“敲门砖”去敲开复辟的“幸福之门”。

旧中国的权势者把孔子当作“敲门砖”，外国的权势者也不例外。当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总是要把孔子抬出来，说什么侵略中国就是要在中国“恢复孔子之教”，把中国变为“王道乐土”。鲁迅曾经写了好几篇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尊孔的实质。他说：“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但是，不管中外反动派把孔子抬得多么高，吹得多么响，

然而“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历史充分证明了鲁迅概括的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几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深受中外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身受孔子之教的思想枷锁的束缚，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看透了孔子和孔子之教的反动阶级本质。几千年来反动统治者竭力吹捧孔子，用种种手段来树立孔子的权威，甚至每个县都修造了圣庙，但是劳动人民并没有把孔子作为“圣人”来供奉，对于圣庙，“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因为他们懂得，孔子的学说是为“权势者”服务的，是用来统治人民的。“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因此，鲁迅指出：“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就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代表。他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同孔家店及其卫道者们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他把战斗锋芒指向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尊孔和反尊孔的斗争从来就是一场政治斗争。鲁迅总是把批孔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从现实的阶级斗争出发，无情地摧毁反动阶级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孔家店。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这是鲁迅在长期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阶级斗争经验。只要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是不会结束的，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尽管孔子这具僵尸，已经埋葬了两千四百多年，孔子这块“敲门砖”早已腐朽不堪，孔子所维护的剥削制度也早已被中国人民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中外反动派还是死抱住这具僵尸不放。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都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他们贩卖孔孟之道，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吹得神乎其神，说成“在现代可以成为

美德”，是什么“中国文化之来源”。国民党反动派最近在台湾也在大肆祭孔。社会帝国主义也煞有介事地把腐朽的孔孟之道称作什么“优秀的文化遗产”，叫嚷要保护孔子。这一切反映了国内外反动派勾结得多么紧密。他们还妄想利用孔子这块“敲门砖”去敲开复辟之门。但是，正如鲁迅总结的那样：“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一切反动派必将被历史的巨轮碾碎在门外。而这些反动派却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在今天更看清楚“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关于“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教导，学习中国革命的巨人——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彻底摧毁孔家店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而坚持不懈地战斗。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

学习鲁迅批判尊孔反法 思潮的革命精神

黄曼君

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了一场大论战。一方面，以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为代表，逆历史潮流而动，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镇压奴隶起义，反对社会改革，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另一方面，以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为代表，顺应时代的潮流，在奴隶革命摧毁奴隶制的基础上主张社会改革，建立新的法治，限制和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鸣锣开道。

两千年前的这一场论战，在封建社会里发展成为尊儒反法与尊法反儒两条路线的长期、反复的斗争，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斗争更为激烈。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二、三十年代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以反潮流的彻底革命精神揭露了孔子和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肯定了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对于借尊孔反法达到反动政治目的的种种逆流进行了猛烈的扫荡。当前，学习鲁迅批判尊孔反法思潮的彻底革命精神和丰富斗争经验，对于我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搞好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借尊孔反法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阴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鲁迅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坚决反对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他的杂文及其他著作都贯穿着这条革命批判的红线。在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写了小说《狂人日记》、杂文《十四年的“读经”》等重要文章，批判了孔子。一九二七年以后，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反“围剿”、反侵略斗争的高度考察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等著名的讨孔檄文，对尊孔读经的反动逆流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鲁迅主要是从下列三个方面对孔家店进行揭露和批判的。

首先，鲁迅剥开了孔圣人的画皮，深刻剖析了孔子和孔孟之道的阶级本质。在五四时期，鲁迅就针对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进行了解剖，指出孔孟儒家所谓“仁义道德”的本质就是“吃人”。在三十年代，鲁迅进一步明确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孔子确实计划过治国的方法，他不是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口号，要复兴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制度，让已经失去权力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吗？他的思想核心，那个无所不包的“仁”字中，无论是孝悌、忠恕、德、智等等，

不都是为了恢复固有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以维护已经崩溃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吗？因此，所谓“仁义”，所谓“治国”，就是镇压、剥削劳动人民，就是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针对孔孟之道所标榜的“王道”和“仁政”的谬论，鲁迅斩钉截铁地指出：“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将笔锋直捣所谓“王道”“仁政”的老祖宗，也就是孔子梦想恢复的周朝奴隶制统治，指出就是这个“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对敢于“扣马而谏”持不同意见的人，非用武力将他们“拖开”不可，对敢于造反的“顽民”更非屠杀到“血流到漂杵”不可。王道的谎言用霸道来支持，霸道的血迹用王道来遮盖，阶级斗争的事实就是如此。这样，鲁迅便揭露了孔子作为奴隶主代言人的阶级本质，撕碎了孔孟之道所谓“王道”“仁政”这块掩盖剥削阶级血腥统治的遮羞布。

其次，揭露了反动统治者尊孔的反动政治目的。鲁迅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反动统治者尊孔读经，不过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把孔子“当着‘敲门砖’”来使用。反动统治者总是用反革命两手来对付劳动人民，他们既用“钢刀”，又用“软刀子”，孔孟之道就是他们使人“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

北洋军阀袁世凯登台后，在屠杀革命党人的同时，就“新做了古怪的祭服”，盛行祭孔，“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可见袁世凯尊孔的目的就是为了复辟。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文化“围剿”，“尊孔读经”就是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蒋介石手上血迹未干就跑

到山东去祭孔；当时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大革命前伪装革命，上台后，也极力鼓吹孔孟之道，大谈“忠孝”，捐款修建孔庙。鲁迅尖锐地讽刺他说：“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并且称这种变化无常的反动政客为“‘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这些屠杀革命人民上台的大刽子手还在上海举行过大规模的祭孔，甚至在会上用四十种古今乐器演奏了相传孔子当年听了曾“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鲁迅通过鲜明的阶级对比指出：“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孔庙重修”也是“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的。由此可见，所谓“尊孔读经”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维护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服务的。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野蛮的军事侵略的同时，也竭力鼓吹“中日亲善”，发扬“王道精神”，宣称要凭借孔孟的“仁义之道”把“全亚洲”建成“王道乐土”。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京汤岛圣堂建起了日本最大的孔庙，蒋介石反动政府与之相呼应，派了孔子的“七十二世孙”前去“参拜”。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就曾提倡“整理国故”、鼓吹“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在三十年代，更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王道”帮腔，献上他的“征心策”，要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针对中日反动派鼓吹“王道”的猖狂活动，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有力的一击，反动派以“王道”做“新药”，为他们侵略卖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反动实质便昭然若揭了。

再次，指出了鼓吹尊孔的中外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冲

击下已经摇摇欲坠，作为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孔子，违背历史潮流，力图挽回奴隶制崩溃的颓势，结果只能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鲁迅指出，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他“下野，失业”，“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生动的叙述，活画出孔子“若丧家之犬”的狼狈相。历来反动统治者把孔子树为偶像，利用孔孟之道毒害和奴役人民群众，以使他们的统治长治永安。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鲁迅指出，反动派愈是利用孔子，“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那些“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孔孟之道治天下的企图，不过是痴心妄想，“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袁世凯等反动头子也想用孔子这块“敲门砖”来敲开“幸福之门”，“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二)

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反对儒家的复古倒退并强调变革的。因此，历来反动统治阶级在利用尊孔崇儒来达到反动政治目的的同时，必然要反对法家和一切法家思想的继承者。他们虽然一方面都沿袭了秦统一中国后所创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但另一方面总是反对法家和法家思想，特别是大骂采纳了法家思想的秦始皇，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法家思想对社会变革的促进作用，妄图扑灭一切

于他们反动统治不利的进步思想。在对法家和秦始皇的评价上，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同样表现了反潮流的彻底革命精神。

对于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鲁迅批判了历来儒家对他的作品的攻击，并且从当时儒法论战的背景上，对他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屈原是楚国人，他代表楚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强、外抗强敌；在哲学思想上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怀疑和批判了儒家的天命观，与奴隶主贵族阶级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在《天问》这首诗中，对于奴隶主阶级关于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疑问和批判。

正如鲁迅评价屈原时指出的：他“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既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又如，关于屈原的长诗《离骚》，历来儒家肆意贬低它，而一味赞扬《诗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诗经》是他们的祖师爷孔子编汇的，而且，孔子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离骚》则表达了对奴隶主贵族集团的不满和愤恨。鲁迅批判了历来儒家对《离骚》“訾而绌之”肆意贬低的倾向，并且认为《离骚》较之于《诗经》“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就是说，它敢于打破奴隶制的旧秩序和思想桎梏，“为前人所不敢言”。

鲁迅在儒法论争上表现的反潮流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秦始皇的评价上。我们知道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当时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正向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制过渡。广大奴隶和平民的革命是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动力，而秦始皇则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崇尚法家，反对儒家，勇于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和措施，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在我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焚书

“坑儒”就是秦始皇所采取的进步措施之一。他焚的书是《诗》、《书》等复辟奴隶制的舆论工具，他坑的儒也是为推翻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复辟奴隶制大造舆论的反动儒生。“焚书坑儒”是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可是历来许多保守、反动分子总是篡改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恶毒咒骂秦始皇。一九三三年一月，正当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焚烧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而蒋介石也效法希特勒加强法西斯专政的时候，许多中国和日本的论者在传统观念的支配下都把希特勒的烧书比作秦始皇。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写了一篇题名《华德焚书异同论》的杂文，一方面对德国法西斯和蒋介石反动统治进一步法西斯化的罪行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另一方面反对了曲解秦始皇的逆流，对秦始皇作了正确的评价。鲁迅指出：“德国的希特勒先生们一烧书，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于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这就揭露了历史上反动分子对秦始皇的指责及其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实质，鲁迅还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及其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进步作用，其中特别指出秦始皇“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他烧掉的只是反动的儒家经典，却“没有烧掉”对社会发展有利的“农书和医书”，在充分肯定秦始皇的进步作用的前提下，鲁迅还指出了秦始皇作为剥削阶级政治代表的阶级局限性。这样，便对秦始皇的功过作了全面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评价，有力地反对了攻击秦始皇的逆流。

对于先秦时代，除屈原和秦始皇以外，鲁迅还肯定了法家的另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荀子、李斯；对于两汉时代，鲁迅肯定了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董仲舒的儒家学说；对于宋代，鲁迅肯定了具有法家思想并实行变法的王安石，批判